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808/(G)

主管 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

北京语言大学报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12年10月30日 第254期 共4版

网址: <http://news.blcu.edu.cn>

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报编辑部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跨文化论坛举行

本报讯 10月20日上午，“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跨文化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报告厅拉开帷幕。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是为纪念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周年暨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建立15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学术盛会。

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校长、黑龙江大学张政文校长、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崔希亮校长在致辞中追溯了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及相关学术成就，他说，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于1997年成立以来，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量本学科的专业人才，为我校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是我校继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后的第二个博士点，也是继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之后在中国单独获准设立的第四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博士点。他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多年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继续支持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张政文校长在致辞中感谢并期冀比较文学界同仁们在发扬人文学术的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成就。王宁教授也在致辞中肯定了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在比较文学界做出的贡献，回顾了与北语比较文学所的深厚友谊，并表达了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祝愿。开幕式由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崔希亮校长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学术顾问乐黛云、曾繁仁、杨慧林、张政文及学术咨询委员曹顺庆、张西平、陈跃红、张辉、郭英剑等颁发了聘书。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跨文化阐释理论与实践；国际汉学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等。参加此次论坛的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教授、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墨菲、德国汉学家吴漠汀等50余名来自全国各高校及海外的专家学者。我校比较文学研究所李庆本教授、阎纯德教授、钱婉约教授、陈戎女教授、周阅教授、沈建青教授、黄悦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



研讨会。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新华文摘》杂志社、《中国教育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代表。

乐黛云教授做了题为“复杂思维与世界文学”的大会主题发言，指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考虑思维方法的转变。各民族文化上的汇通不可避免，但是否会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抑或是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发展，其结论还有待商榷。她还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正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只有囊括了人性普遍特性的民族文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学。

曾繁仁教授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内学者常常采用西方话语进行研究论述，但中国古代生态美学就已涵盖完整的美学话语归类，认为我们应该通过现代阐释对其进行充实改造，与西方理论交流对话，将其纳入现代美学体系。杨慧林教授主要谈到了中国典籍的外译问题，他认为只有汉学家们主动翻译中国作品时，才能真正说明我国的民族文学向世界传播是成功的。曹顺庆教授则认为无论译者的主体是汉学家还是本国学者，典籍的外译作品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并与参会者交流了近年来对一系列诸如《诗经》、《楚辞》等典籍的外语译作的研究工作。

王宁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他指出在后人文主义时代，机器给人类

带来的是希望和绝望的并重，同时，当代的文学研究仍需建立在广泛的文本阅读之上。张西平教授在“跨文化视域中域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这一主题发言中对“汉学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一看法提出批评，认为国内学术研究应与国外汉学界展开学术上的互动，走出汉学界的学术壁垒，建设中国学术界新的国际话语体系。来自美国的Patrick Murphy教授介绍并讨论了在戈什、格蕾丝和辛哈应对挑战的环境小说中的社区复原力和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认为在这三部小说的作者们似乎在寻找一个折中方式来鼓励共生互依。李庆本教授提出了自己关于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和重新构建世界文学新格局的理解，指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突破以往“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二维模式，包括翻译在内的跨文化阐释方法将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策略。

陈跃红教授作了题为“钱钟书诗学研究方法例说”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目前对钱钟书的研究还缺乏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总结论述了钱钟书创作中存在的同异关系辩证法、引证逻辑及跨学科三个特点，认为钱钟书的创作方法是其研究的一个中间地带，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认为文学的民族性和公共性决定了其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某种超民族性，正是普世价值决定了超民族性的存在。德国汉学家、《红楼梦》德文版的译者吴漠汀从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谈到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新华文摘》的编审陈汉萍女士做了即席发言，对代表的学术分享表达了感谢，并表示愿意为更多优秀的比较文学学术文章提供发表交流的平台。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的朱睿达博士通过征引中西对于形神问题的思辨，在跨文化视野中对形神之争这一文学艺术话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发。在会上，郭英剑、高旭东、陈戎女、周阅、马汉广、顾钧、林精华、钱婉约、沈建青、李玲、关立丹等教授都做了精彩的发言和评议，与会代表们切磋学术，不同观点相互碰撞，讨论热烈。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世界文学研究的学科优势，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而被世界广泛接受，已成为我国学界所关注的话题。此次跨文化论坛的召开，为学者聚焦讨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提供了契机，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比较文学研究所)

本报讯 10月25日，李宇明书记走访教二楼，全程听取了社会科学学院张昱琨教授为信息科学学院2012级学生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崔希亮校长来到教四楼视察教学情况，并听取了周阅老师的《外国文学简史》课。

课后，李书记与张昱琨教授、校教学督导员陈田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共同研讨了相关问题。李书记在谈到他选择听这门课的原因时表示：一是关注教授上讲台、特别是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情况；二是了解公共课授课情况；三是考察我校唯一的工科学院学生对于人文类课程的学习情况。

结合听课情况，李书记谈了几点建议：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在全校形成尊重教师、尊重教师劳动的风气。学校要注重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在课程设计方面适当增加体现专业特点的相关人文课程。相关部门要通过听课发现人才，推出名师。

李书记高度评价了张老师的课程，认为张老师讲课有新意，能够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对学生深有启发，对课堂有掌控力，他独特的风格使课堂趣味盎然。李书记同时提出，教师要注重调动和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李书记还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可能地为教师提供教学服务，有条件的时候配备好教师休息室、饮用水等，在教室布置方面多花心思。

崔希亮校长在课间走进教四楼，逐个教室进行视察，对教师的课前准备、教室的设备情况、教学区环境等进行检查，并与学生交谈，询问了学生的学习情况。随后崔校长听取了人文学院周阅教授为2011级新闻专业开设的《外国文学简史》课。

课下，崔校长与周阅老师、人文学院院长华华学诚、教学督导员刘希明教授进行了交流。他首先谈了对该门课程的感想，肯定了周阅老师备课认真充分，课堂教学条理清晰，内容充实，节奏控制得当，具有良好的教学素质。同时，崔校长还与大家交流了对大学教学的认识，他提出，大学教育应更多注重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尤其是知识性课程；大学生应在课堂上多读书，在课堂教学中有更多主动性，更多参与到课堂互动讨论中；教师学术思想对学生的影响，以及课堂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是需要教师思考的问题。此外，他还指出，多媒体课件的过分使用会影响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教务处)

本版编辑 咸俞灵

校领导视察教学情况并听课

老舍茶馆成为我校实践教学基地



示，很期待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为来华留学生实践活动提供场所，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

参加本次揭牌仪式的还有教务处翟艳副处长，教务处高玉峰副处长，汉语学院赵菁副院长，汉语进修学院卓争鸣副院长，汉语速成学院陈军副院长，以及各留学生学院的相关教师。仪式结束后，随行的三个留学生学院的学生观看了一场富有京味的文艺演出。

北京语言大学与老舍茶馆合作建立的实践教学基地，通过前期沟通和协商，设计了一套适合我校留学生需要，能够寓教于乐的传统文化表演。同学们可以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中，真正从中体会中华文化的韵味。基地的建立，在丰富学校实践教学内涵的同时，有利于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加深对中国的情感和了解。(教务处)

崔希亮校长做校庆工作汇报总结。主要汇报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校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二是校庆工作所取得的经验；三是校庆后续工作与学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崔校长在报告中说，校庆工作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通过校庆活动，增强了师生员工的凝聚力，增强了对学校未来发展的信心；校庆活动展示了北语的成就与特色，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通过校庆活动，我们传承了北语历史，弘扬了北语精神；校庆活动实现了“学术校庆”的目标，推进了我校学术发展；校庆活动加强了对外联系，推动了交流与合作；校庆期间，各类活动精彩纷呈，丰富了校园文化活动，凝聚了人心；校庆工作锻炼了师生员工意志，美化了校园环境，提高了服务保障水平，实现了“量人为出、节俭办校庆”的目标。他说：全体北语人广泛参与，群策群力，是校庆成功的关键因素；组织有序、指导思想明确是校庆活动圆满成功的有力保证；把校庆工作与学校正常发展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调动全校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是校庆工作成功的重要基础。以上是校庆工作取得的经验，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继承发扬。

大会进行了隆重的校庆工作表彰，授予秘书处等16个工作组“校庆工作优秀团队奖”、授予汉语学院等22个基层单位及志愿者、离退休、保安大队等3个优秀团体“校庆工作优秀组织奖”。伴随着优美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李宇明书记、崔希亮校长为获奖单位、团队代表颁发了证书。(新闻中心)

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回顾与发展：

《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启动编写

本报讯 “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回顾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于10月13日在我校会议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校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发起，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承办，来自教育部、广州市教育局、社科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多所国内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编撰、所承担专题的纲要与思路及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回顾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并正式启动了《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编撰工作。

《当代中国学术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而推出的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以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当代语言学的主要学术成就、发展脉络，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主编李宇明教授对会议作了主

第二届全国文字与计算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文字是人类记录、传播与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在文字信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产生了诸多文字与计算的问题。文字与计算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涉及人文、技术和艺术等学科。

为给国内外从事文字与计算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共同研讨的平台，继2011年10月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召开的“汉字字形计算研讨会”后，10月27日，“第二届全国文字与计算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隆重召开。

本届会议首次面向全国征集论文，得到了国内多家科研机构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响应，收到稿件19篇，内容涵盖“文字结构形式化与编码”、“字形自动生成技术”、“字形分析与处理”、“文字字形评价”、“古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书法仿真”、“汉字字形语料库”等多个方面，投稿单位包括北京大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

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字形视觉效果偏好的认知评价》、《残缺字的计算机综合和识别技术》、《商标中负形字体轮廓的提取》、《基于笔画组合和识别技术》、《《宋体》笔画特征点统计分析》、《脱机手写汉字细化消歧方法》、《宋体汉字字形的部件与笔画缩放变换关系研究》、《汉字笔画的自动提取》、《基于动态描述库的汉字字形自动生成技术研究》、《基于笔触特征三角形的手写汉字书法效果美化方法》等多篇学术论文，引起了与会研究者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字与计算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开拓，需要深入研究，让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携手共同发展壮大这个交叉学科。(新闻中心)

2012-2013学年学生骨干培训班结业

本报讯 10月19日，北京语言大学2012-2013学年学生骨干培训班结业典礼在逸夫报告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赵曼教授出席结业典礼，校团委、各学院分团委总支干部以及全体校级团学干部参加了此次活动。

赵曼副书记从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剖析了当今大学人才培养的路径；从世界对人才的要求分析了现在社会的人才观，他还就如何保持干部工作与学生身份的动态平衡，学生干部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学生干部的角色等问题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他说，学生干部具有榜样、学生、专家等多重角色，希望广大同学扮演好每一个既定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校团委书记舒三红对本次培训班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宣读了《关于表彰2012-2013学年学生骨干培训班优秀学员的决定》。随后，来自各个学生组织的学员代表依次发言，阐述自己在此次培训班中的感悟收获。最后，与会领导

本届培训班持续一周，共有来自全校各个年级、各个学院的近400名学生干部参与到本次的教学活动中。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理论学习、实践教学、小组研讨和素质拓展。

校团委邀请校党委赵曼副书记、团市委杨海滨副书记、北京大学庄明科教授、我校社科院张昱琨教授为同学们带来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培训。特别是上周日，校团委与北京市大学生服务中心合作，为培训班200多名学员进行了素质拓展训练，达到了凝练团队、提升素质的目的。

此次培训班是为贯彻落实纪念建校90周年大会和北京市第十三次团代会精神，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切实加强我校学生骨干队伍建设，提高我校学生骨干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而举办。校团委希望通过此次培训，提升我校学生干部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以便更好地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团委)



与北语同行

纪念北语建校50周年系列访谈

谢小庆：大半生都在做“考试”这个事儿

本报特约记者 李玉婉

认识谢小庆老师，最初是通过他的博客。他6年笔耕不辍，写下了近千篇博文，还有大量的图片与影音资料，这些都记录下了他对专业研究的孜孜追求，在思想领域的深深探索，对往昔岁月的追忆感怀以及对现今生活的点滴感悟。翻看一篇篇博文，犹如走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文字之砖砌成思想之厦，徜徉其中，令人受益匪浅。有幸在今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来到谢老师的办公室，听他讲述自己的学术历程和教学心得，他对学术的热情，对教学的热爱始终洋溢于那爽朗的笑声中，在这一系列交谈中我也更为深入地了解了这位慈爱的老师以及他从事的事。

“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句话出现在谢小庆老师退休前夕的课堂PPT上，在即将结束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之时，他以“朝闻道，夕死可矣”来自勉。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谢老师亦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测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而在许许多多身份之中，他更在意的是执着于学术，钟情于钻研的学者身份。

谢老师的专业为心理与教育测量学，自从1978年进入大学学习心理学开始，他的兴趣就集中于教育和心理测量这个分支。“主要是考试，我这辈子做的就是这么个事儿。”谢老师淡然一笑。这岂止一件“事儿”那么简单，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这么个“事儿”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作为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发者之一，谢老师在北京见证了HSK的发展壮大，在论及这项考试的影响力与重要作用时，谢老师难掩自豪之情。除此之外，他还参与研发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国家职业汉语能力考试(ZHC)等等。这些现在已广为普及并有着重要意义的考试，其中凝聚了多少谢老师和他

的团队的心血。在谢老师看来，还有一个他此生中参与的颇为重要的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自从1988年开始为国家人事部考试录用司组织的录用考试主持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命题以来，他为此项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今，北京语言大学考试安全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资质认证的机构，对公务员考试安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谢老师谈及“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命题中心”和“考试安全中心”，他好似看到子女取得了莫大的成就，那喜悦溢于言表。

在论及研发这些考试中所遇到的困难时，谢老师叹道，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困难的，没有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繁芜丛杂的汉语语言现象，如何考试，考什么，怎么考，怎样实现高分高能？这些都如一场更为严酷的考试，需要学者们来作答。在工作中，他未曾懈怠过，即使是节假日，深夜十一点多而工作室依旧灯火通明是常态。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1967年，16岁的谢小庆离开北京，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谢老师回忆说：“我当知青，是在国家发出号召之前，那时自己想到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11年的草原牧歌生活之后，因为高考恢复而考回了北京。此后的30年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他那股大有作为之豪气依旧回荡，他那忧国忧民之情依旧浓烈。

谢老师博客中记载过他于1975年去云南石林游览时所写的文章。那时的他在石林胜境中，见显赫官员游玩驱车宿豪华宾馆，思农工凿山开壁之艰难，遂发出“哪一日同游胜地无分权卑？”之问。而在谈到国家公务员考试时，谢老师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阶层间的流动，特别是不能让下层穷苦的人看到希望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不安定的、没前途的。而我们所作的恰恰是帮助那些人，给他们带来希望。”从青年时代直至今日，谢老师忧国忧民之情犹如杜甫那般，认为使“天下寒士俱欢颜”，才是教育根本之所在，是考试选拔目的之所在。

教育的公平能改变人的命运，考试的科学化能改变教育的质量，考试的研究水平直接影响到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影响到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如何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如何通过教育、通过考试实现公平，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在博文中关注各种考试，关注教育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怎样使教育更符合实际需求，怎样使人才选拔更合理，在谢老师的专业范围内，他努力做到最好。“考试是测量人的能力的，就像一个体温计一样。但是这个体温计不准，如何为体温计的质量把关，是我们在做的。”他还形象地说：“技术监督部门兢兢业业地监督冰箱、洗衣机、彩电的质量，但却对于影响人前途的考试质量不闻不问。”于是，对于决定人命运的考试的质量进行测评，便成了谢老师致力于一生的事业。

“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

1991年，谢小庆老师来到北语。2011年，他退休了。在谈及他的教学生涯时，谢老师讲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在研究生论文答辩完以后，原本再无上课义务的谢老师为学生精心准备了几节课，更多的是教授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他的学生后来无不感慨地回顾说：“固然要文凭，也要有水平；固然要学历，也要有学问。”

另一个故事是，谢老师在给研究生教授教育与心理测量学这门课时，以往采取的教学形式是他在讲台上讲授，学生听讲。由于他生动的讲授，课堂一直是广受学生好评的。但是渐渐地他觉得，一个人的精彩表演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一堂精彩的课，而要还课堂给学生，改传统的以教师中心为以学生中心，进行课堂讨论。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在他教学生涯谢幕之前被改变，他以探索的勇气来创新，收到了更好的效果。他说：“我完全可以按照以往的方法继续教授，不必重做讲义和重拟教学思路，但是我还是改变了。为了让学生能力得到锻炼，这个改变不怕迟到。”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生可能会从听课中得到了获取知识的乐趣，但他们失去了自己思考探索的能力，学生可能在学校中得到了理论的丰富，但他们还需要实践能力的提升。

正当我们谈论课堂因创新而带来的意外的效果时，谢老师的一位学生前来拜访。她生动地描述了在谢老师课堂上，同学们思想迸发，激烈地唇枪舌战，在必要时候，老师的一句恰到好处的评点总能是警醒同学。这样的模式使学生们收获颇丰。

谢老师在谈及学生的学习与就业时说道：“不怕无人请，只怕艺不精。”他鼓励学生多付出，多努力。“我的一些学生在读研期间，她们一个人一年干的工作，相当于别人20年的工作。……只要有真才实学，只要确有本事，即使有人想拦也拦不住的，想压也压不死的。”谢老师希望学生能真正学到本领，他相信能来北语学习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希望他们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获得本领。

在对谢老师的采访中，不时地为他对专业的激情所感染，也被他对教学的热爱所折服。他的人生智慧在话语间涓涓流出，令人回味无穷。“现在退休了，想多读一些自己想读的书。”学而无涯，年轻时他想精读而觉奢侈不敢读的那些古代典籍，现在也大概可以得闲一阅了吧。期待着谢老师在他的博客上与我们分享他的阅读心得。

本版编辑 王黎黎

你好，先“声”

——第三届语音语调大赛精彩落幕

10月25日晚，高级翻译学院“你好，先‘声’”第三届语音语调大赛在逸夫报告厅顺利结束。来自汉语学院的留学生西里尔、11法语系的张耀中和11法语系龚正分别摘得了中、英、法三组的冠军，12法翻戴欣怡获得最佳人气奖。高级翻译学院领导、教师代表及中、英、法七名评委老师都来到比赛现场。

比赛分为三个部分：模拟联合国大会、电影片段配音及决赛环节，决赛环节中文组为绕口令，英语和法语组为“非诚勿扰”角色扮演。第一环节中，主持人客串联合国大会主席，每三组选手针对一个热点话题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发言，热点话题共两个，分别为“哪个国家的语言应该成为世界语”、“世界末日时哪个国家应该登上诺亚方舟”。每位选手发言时间为一分钟，稿件难度适中。选手们在这个环节中为了自己代表的国家而战，侃侃而谈，自信而坚定。

第二个环节为电影配音，也是本次比赛中观众笑声最密集，最活跃的一个环节。六组选手按照编组，演绎自备配音片段，他们分别绘声绘色地演绎了《马达加斯加3》、《汽车总动员》、《情深深雨蒙蒙》、《生活大爆炸》、《霹雳娇娃》及《爱在那一天》的片段。配音选取片段新颖、跨度广，深受学生喜爱，梁爽老师事后对此次环节赞赏有佳。

两轮环节后，中文组共有3名留学生进入绕口令环节，英语组共有10名选手进入决赛环节。选手们在这一环节展现出的临场发挥能力、幽默感等让人耳目一新。

此次比赛旨在向同学们推广外语学习时语音语调的重要性，发现更多的北语“好声音”。

(高级翻译学院)

●校园简讯

我校喜获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近日，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招标评审结果名单正式公布，共立项91项。我校由李宇明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获得立项，实现了我校国家级重大项目零的突破。

本课题总的框架由宏观形势与理论研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学术蓝本研制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社会服务研究三大部分构成，据此，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个大的方面：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形势、任务及对策研究；新时期汉字规范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新时期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新时期汉语词汇、语法、语用规范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语言文字规范的社会应用与服务研究。研究队伍整合了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渤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相关学术力量。(科研处)

严格教学管理，加强学风建设

“严格教学管理，加强学风建设”教学检查活动日前启动。10月15日至19日，教务处分四个时间段，巡视了教一楼、教二楼、教四楼和逸夫楼的教学秩序和纪律。巡视过程发现，各教学单位及领导高度重视教风、学风建设，大多数教师能严格按照教师规范等履行教师职责，按时进入教室。有的老师7:50就进入教室，指导学生朗读；有的老师下课5分钟了，还被学生团团围住，解答问题，反映出北语教师爱岗敬业的教师风范。巡视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教一楼教师迟到2-3分钟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他教学楼教师提前下课的情况也屡有发生。针对不同问题，教务处已跟相关学院做了沟通，并在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及时恢复了教二楼、教四楼和逸夫楼的上课铃声。(教务处)

校领导观看艺术系毕业生汇报展

10月18日，我校艺术系中国书画专业乔金塔同学书法篆刻汇报展在人文学院艺术展厅开幕。李宇明书记、崔希亮校长和许多师生前往观看。

汇报展上，李书记和崔校长与乔金塔同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此次展出的作品给予好评，并向乔金塔同学和艺术系学生提出了期望，鼓励他们继续坚持艺术创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李书记和崔校长还欣然为此次汇报展挥毫题字。

乔金塔同学2009年考取我校人文学院艺术系中国书画专业，主攻书法篆刻。该同学在篆、隶、楷、行、草等书体上均有涉猎，是我校艺术系优秀学生代表之一。(新闻中心)

SK高管班结业 学员感谢北语

10月17日，汉语速成学院第15期韩国SK集团高管汉语培训班结业仪式在会议中心举行。第15期SK班共有4名学员，本期高管班从8月13日开始，10月17日结束，为期8周。汉语速成学院领导高度重视，选派优秀教师，在充分总结借鉴前14期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模式，优化课程设置，全面实践任务式教学，确保SK班的教学效果和SK教学模式的成功。

在结业仪式上，四名学员用汉语发表了结业感言。学员们表示，北语的教师和教学是最好的，北语的学习经历，将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SK项目是汉语速成学院与国际知名大企业合作的成功典范，始于2006年，8年来为SK集团培训了200名懂汉语、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中国视野的中高层管理人才。SK教学模式以其鲜明的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特点，成为汉语速成学院高端汉语培训战略的重要一环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品牌。

(汉语速成学院 李先银)

北语社获评“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集体”

日前，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联合开展的2010—2012年度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中，我校出版社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集体”，出版社张健总编辑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个人”。此次共评选表彰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集体共计65个、先进个人共计200名。(出版社)



对外汉语 挚爱一生

学生记者 李岁竹

感触：国外教学与国内教学的不同

虽然都是对外汉语教学，但工作在国内还是国外二者是有很大不同的。陈老师对记者说，在国外教学和在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外面对的是一个国家的学生，学生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进行解释清楚并不难，但是在国外教学，面对的是十几个乃至更多国家的学生，他们的母语不同，教学时就相应地会有难度。从这一点来讲，国外教学比国内教学似乎更容易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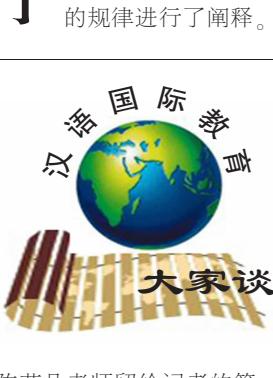
然而国外教学毕竟是在国外，用陈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你在别人国家教课，你得适应人家”。她介绍道，在美国上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就要把这个学期的整体安排告诉学生，比如考试时间、出勤等活动在综合评定分数中所占百分比等等；每一天的Schedule也要提前告知学生。美国学生的法律意识很强，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关系到个人的综合评定，因此他们对分数非常看重。这是每一位在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师需要注意的。陈老师说，在国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我们不仅要专注于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也要注意适应别的国家的规则，我们的方法换了国外环境要得通。中外观念不同，因此绝对不能照搬国内的模式和经验，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在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被问及最有感触的教学经验时，陈老师很肯定地说，教学中很重要的是经验的总结，教学必须要经过实践，因为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外工作充满挑战，因其教学对象变化太多，则更要不断在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及时作出改变。陈老师在新西兰做汉语顾问工作时，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还不是很好，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如现在。陈老师负责参与教材制作，因为在注重教材趣味性、用录音、录像保证教材生动性的同时，把汉语作为一门外语的教学方法也很重要。编写教材的人不一定是中国，甚至不一定懂汉语，但是要懂得语言教学方法，这样的编写者与汉语为母语的人合作，就可以编写出优秀而实用的教材。这也是陈老师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直走下去

1989年学业完成后，陈老师选择了对外汉语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她表示会一直坚定地在这条职业道路上走下去。

陈老师很享受对外汉语教学这份工作。在新西兰做汉语顾问时，她为传播中国文化，辅助对外汉语教学所做的管理工作，相比于以前的对外汉语教师工作，这次做汉语顾问是一种新的挑战，从这个角度、这个工作岗位上做一些管理工作，传播中国文化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工作出色，三度出国

从1989年到2012年，陈老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二十多个年头。这二十多年里，陈老师既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留学生课程，也曾三次被派往国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可谓是经验丰富，资历颇深。

1994年，已有五年工作经验的陈老师第一次到美国密执安州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流项目，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一次体验和热身，那么2008到2009年这一次就是正式的出国教学了。2008年，陈若凡老师前往美国俄亥俄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当时北语和俄亥俄大学的交换项目刚刚建立，所以陈老师也是北语第一个派去的俄亥俄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师。陈老师介绍，在这次的项目中，汉语是作为一门外语——类似公共选修课的课程来进行设置的。一周有四个课时，共四个年级，陈老师负责教授一、三年级。

中外文化差别大是每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陈老师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量消除文化差异对学习语言造成的障碍和影响，俄亥俄大学在汉语课之外每周都会举办一次文化活动，中国书法、电影、饮食等有关中国文化的方面均有涉及，以此来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以便学生们更好地学习汉语。

陈老师的三次出国经历中，较其他两次有所不同的是去新西兰。2001到2002年，陈老师受国家汉办委派去新西兰做中小学部分的汉语顾问。当时在陈老师所在的学校共有日本、德国、法国等五个国家五个语种的工作处，如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等。作为一名汉语顾问，陈老师主要负责学校汉语教学方面的监督、考察、组织研讨会等等，并且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打交道获取政府支持，也负责组织、参与一些文化活动如国际文化周等等。用陈老师的话来说，相比于以前的对外汉语教师工作，这次做汉语顾问是一种新的挑战，从这个角度、这个工作岗位上做一些管理工作，传播中国文化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综合新闻

政府对日语对外教学很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而汉语传播、教学力量在那时还很薄弱，教材、教师等资源都比较缺乏。陈老师在教学督导工作之余还会办一些journal，当中涉及各民族文化、各校汉语教学情况、教学辅助材料等等。虽然那时候材料还很少，国家支持的力度不如现今，陈老师从教师到顾问的角色转变也使她适应了不短时间，然而她还是真心地认为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深深地爱着这份工作。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使人有一种成就感。陈老师当时选择这份工作主要是出于兴趣，觉得和外国学生打交道是很有趣的事情，工作多年之后，这份心情也由喜欢转化成深深的爱。学习汉语的许多学生都是零起点，看着他们一点点学会汉语并渐渐说得流利，是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心中最高兴的事。陈老师工作二十多年，接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在与学生的关系方面，她说：“我们之间既是朋友也是师生。周总理曾说，‘外事无小事’，我们作为中国的汉语教师，出去教学代表的是我们国家，因此我很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工作这么多年，陈老师明显地感受到国家在这方面所投入力度的加大，她对此也感到非常欣慰。陈老师非常希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能发展得更好，她还建议学校应加大宣传力度，让全世界知道北语的优秀之处，这样的工作应该延续下去，北语要发展自己的特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校。

陈老师坚毅的眼神透露着对北语的信心，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传播发展的信心。弘扬中国文化、传播汉语的道路还很长，期待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前排左三为陈若凡老师



“民生与正义：梁晓声创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民生与正义：梁晓声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文学创作、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贡献卓著，其作品影响了一代中国人。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知青小说创作闻名，后在小说创作、影视剧本创作、随笔写作各方面均成果卓著。代表作品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浮城》、影视剧《年轮》、《知青》，随笔集《郁闷的中国人》，社会学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2012年10月13—14日，北京语言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为期两天的“民生与正义：梁晓声创作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21个科研、教学单位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24篇，梁晓声年谱1份。1场主题发言和4场学术研讨会上中共有27位学者对梁晓声创作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研讨会上期间梁晓声先生还与时事评论家、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先生做了一场对话。闭幕式上梁晓声对学者们的研讨做了回应。

一、评价梁晓声的知青文学

梁晓声知青文学的评价问题是本次会议研讨的重点。这根源于梁晓声作为知青文学作家的文学史定位，也是对前一段时间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知青》现象的自然反馈。如何评价梁晓声的知青文学，关键问题是评价其历史反思深度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是富有历史反思深度的，但这一深度是否充分却各有不同的看法，从中也显现出学者们历史观之间的差异性。

评价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的反思深度是否充分的关键，是研究者在自身的价值取向中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个人的青春记忆、理想追求是否可以与历史的错误、个人与民族的苦难相对剥离开来。

路文彬、胡玉伟、车红梅、刘军茹等学者对以上问题做出的是肯定的回答，因而他们倾向于认可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路文彬认为，固然要反思“文革”的错误，但是不能否定我们自己的那段心灵史，否则就等于否定了我们自身。胡玉伟强调在梁晓声创作中，知青一代人自身的善与“文革”的恶是对立的。他说：“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苦难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再经过过滤性抽取升华成为精神财富，作为‘再教育’运动背景的‘文革’被推到远景。作者试图以此与‘文革’拉开道德上的距离。……在作者笔下，一代人以自己的善和正义与‘文革’的恶进行精神上的较量，‘相信未来’的乐观的历史观使得悲剧最终被正剧化了。”车红梅认为梁晓声小说“充分观照北大荒知青的正面价值”，因而“梁晓声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刘军茹认为《知青》“在温暖的向善的人性体悟及叙事中”为“传达知识分子理念和适应主导意识形态规范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桂琳则通过对知青成长书写的类型分析切入，认为不同于现

实性成长书写和浪漫型成长书写，梁晓声的知青创作属于反思型成长书写。

王春林等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是否定的回答，因而他们倾向于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反思的深度是有限的。王春林在知青文学视阈中审视梁晓声的新作《知青》，认为“梁晓声在骨子里还是那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的梁晓声，他实际上并没有走出那种‘青春无悔’的知青情结。既然‘青春无悔’，那么，那个特定的知青岁月就容不得轻易否定。这样，如此一种‘青春无悔’理念的存在，自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梁晓声历史反思精神的消解。”王春林从梁晓声的文学审美理念、梁晓声的情感记忆和电视剧脚本形式三个方面对《知青》的知青英雄主义情结进行了溯源。张志忠、毕光明也认同《知青》是有限度的历史反思的看法。张志忠强调对“文革”反省不够，是一个民族的普遍问题，不是梁晓声一个人的问题。毕光明一方面对长篇小说《知青》的艺术性之不足表示遗憾，认为该小说由于电视剧主旋律要求和大众文化要求的制约，没有体现梁晓声的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该小说文本的缝隙中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特别强调应该把知青文学与知青文学运动结合起来考察。程光炜强调知青文学是知青运动的产物，建议对梁晓声及其同代人做口述史。他认为“知青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梁晓声的创作是将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与80年代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文学，与路遥、柯云路的创作接近，具有史诗性结构。反思学术史，程光炜认为先锋的趣味影响了研究界的评价尺度，造成对知青文学评价不公的状况。陈晓明、吴义勤、杨成志、谭五昌等也都特别强调梁晓声所代表的知青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吴义勤教授认为“梁晓声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他认为梁晓声“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者。”张志忠辨析了现实中的知青哪一部分人会质疑青春无悔，哪一些人会把知青生活变成往后的岁月甘泉。

二、阐释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创作立场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对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创作立场进行了深入阐释。阎纯德强调梁晓声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和人民贴近。”白烨在与当前网络写作的比较中凸显梁晓声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陈晓明把梁晓声界定为“历史记忆的承诺者”、“平民的代言人”，“当下社会的批判者”。他认为，梁晓声是一个从“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的历史空场穿行而过的穿越者。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梁晓声的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坚守、承担。因为他的本真，他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他认为梁晓声为平民代言的文学具有自传性和亲历性的特点，因而他为平民代言就不是为自己确立高蹈的姿态，而具有把每一个人当做人的道情怀、平等心态。陈晓明细致解读了《又是中秋》、《父亲》、《玉顺嫂的股》等作品中的平民情怀。许建辉认为作为作家的梁晓声重点书写的是感性的心灵世界，作为教授的梁晓声所思考的是知识谱系中的理想世界，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关注的是以民生为基础的现实世界。三种身份，指涉三个世界，却共有一个书写、观察、思考的前提——“城市知识者的平民主义立场”。

三、关注梁晓声创作的多样性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强调应该关注梁晓声创作的多样性，并对梁晓声创作的外来思想资源、对梁晓声1990年前后创作的转向、梁晓声创作的理性精神与民生意识、梁晓声创作的爱情书写、梁晓声的荒诞系列作品等问题展开了多维阐释。

张志忠强调，梁晓声的创作世界丰富广博，不是知青文

学创作这一定位所能涵盖的。路文彬在追问中国小说现代传统的外来源中揭示梁晓声创作的特点，认为“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都是契诃夫的传统，而“梁晓声是个例外”，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的传统。他认为梁晓声“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浓郁人道主义情怀，皆与高尔基有着诸多的共性，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人类的希望。作家更应关心的是爱和美好，而不是恨与丑恶。”张重岗通过对梁晓声1990年前后完成的《龙年“1988”》、《“93断想”》等非小说类写作和两篇小说《白发卡》、《表弟》的分析，重新触摸梁晓声在那个转折年代的思想感受，同时讨论他以写作进行历史救赎的路径。李春雨着重研讨梁晓声近年的随笔写作，指出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影响了梁晓声近年的创作，其激情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理性。她认为“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焦虑、批判与智慧是认识和理解梁晓声的三个关键词组。”李东芳认为，梁晓声的知青写作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北大荒自然环境的雄奇和荒蛮既是激情和崇高品格的象征物，也是将‘苦难’浪漫化和诗意图化的重要载体。此外，知识青年的知识趣味也常常在文本中创造诗意。”张艳梅强调不应该用贴标签的方式把梁晓声写作简单化了。她说梁晓声“就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一个人而已”，“与其说他主动给自己贴上知青代言人和底层代言人的标签，不如说时代话语绑架了他”。赵文郁借助萨特存在的主义理论对梁晓声1990年代中期创作的三本荒诞现实主义作品《浮城》、《红晕》、《尾巴》进行了细致解读。崔新玲则通过《伊人伊人》中的文本细读，阐释梁晓声后期创作中爱情叙事中的变化因素和不变因素。

另外，赵文郁制作的《梁晓声年表》细致、丰富、扎实，不仅列出了梁晓声生活、创作中的重要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与当时时代的关系，而且注重发掘这些事件与梁晓声精神发展的内在关系。

四、探讨大学写作课程改革问题

本次与会的一些大学教师还结合梁晓声的教学实践对大学写作课程改革问题展开了研讨。

刘晓丽从“何为写作”、“何为可以教”、“何为不可以教”进入“写作何以能教”这个写作学元问题的内部，探讨写作在什么层面上是可以教的，在什么层面上是不可以教的，并以马正平、李白坚、梁晓声为例，探讨我们如何在可以教的层面上努力，在不可以教的层面上加以引导。她认为“梁晓声教授，以作家特有的身份以及对写作问题的敏感，他不仅在技术上指导学生，更是在引导学生的认知力和感受力，在写作素养的意义上提升学生，让学生懂得写作和生活、写作与伦理的关系。”邓程分析了以文学理论为中心、以文学史为骨干、写作和鉴赏可有可无的中文系本科课程体系的弊端，认为“对现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新的课程体系应该以写作和鉴赏为中心，弱化理论的中心地位，削减文学史课时，大量增设写作和各种专题课程。”方守金建议应该以渐进的方式改进大学课程。胡少卿从一份课堂实录和一份中文专业就业访谈出发，探讨大学中文学写作课程的优化问题。他认为文学写作课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感受力、创造力，倡导跨学科界限，帮助学生成为自由独立的个体。

五、对话：第三次领航的展望

2012年10月13日下午，学者们的研讨在北京语言大学



会议中心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梁晓声先生与时评论家秦晓鹰先生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第三次领航的展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走向做出富有深度的阐释和预测，倡导每一个人都自觉做一个自觉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有历史担当意识的公民。200多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这场讲座，并积极进行了现场互动。

秦晓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改革开放的第一、二次领航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仍遗留了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民主意识的有待发展、“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再加上廉政水平不高，城市化迅速发展造成的管理困难、公共服务问题、生态问题、道德体系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等等，使得中华民族当前再次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这也形成了我们对第三次领航的期待。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有力管理，也是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考验。

梁晓声说，我们要做一个有公民意识、社会关怀意识和历史承担意识的公民，尤其在网络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千万不要做一个无态度、不参与、没同情、不支持、不反对的看客。他形象地说：“前一段时间，游行的时候有人砸别人的车，甚至打伤车主。如果我们受过大学教育，起码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阻止的话，我至少成为围观者的一员，至少不在旁边说‘砸！砸！’如果有人要从楼上跳下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至少我们应该背过身去。”他说，如果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成那种鲁迅笔下的‘看客’，这才叫绝对的失败。他呼唤有更多的新国民，希望大学生们有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踏踏实实地打理好自己的人生，认为这样就等于为整个国家减压了。他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打理好自己的人生的能力。

六、小结及其他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既摆出了梁晓声创作研究的难点，并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思想交锋；同时也指出了梁晓声创作研究的盲点，拓宽了学术视野。学者们还提出了研究方法创新的问题，强调要在文学研究与知青运动研究、文革反思的互动关系中深化梁晓声及知青文学研究，强调要超越单一刻板化的研究模式。本次研讨会深化了梁晓声精神世界的探讨，从而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丰富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研究。本次研讨会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校庆50周年的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北语“学术校庆”的特色。

梁晓声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感言，对学者们的发言做出了回应。他在发言中重述自己批判“左”的思想错误，坚持用美好人性温暖社会的文化立场，强调人的历史承担意识，并就《知青》电视剧的创作、拍摄、剪辑过程做了说明。

文化交流意义的重新体认：反思与重构 ——中外学者再论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学艺术

张杰

为中华文明按照地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圈，这些文化圈要么吸收外来文化思想，要么将中华文明的成果向外辐射。而就在这些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存在有大量杂糅有各种文化元素的民间宗教，比如我国壮族所信奉的“师公教”就是融合了佛、道、儒及原始图腾信仰于一体的地方性宗教。这些宗教拥有自身完整的教义和仪式体系，但长期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甚至遭到排斥和禁绝。梁先生呼吁全社会应该给予这些民间宗教以应有的地位。

除了上述学者对于宗教文化的研究以外，更多的学者仍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文艺本体的论述上，既包括对中国文艺的讨论，也包括对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关注，不过论述的立足点是把它们放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背景下讨论。其中傅璇琮先生和陶文鹏两位老先生的发言极有启发意义。作为老一代学人，陶先生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终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次，良好的多语言翻译，也是莫言获奖的主要条件。最后，莫言的获奖，是中西方文学交流碰撞开出的硕果，莫言确实学习了马克思和福克纳的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从这里面吸取的营养，但是他把它融化到自己中国坚实的土地上来，他既是现代主义先锋派，但是又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陶先生由此指出国际间的文学交流对于促进本国文学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建议中国学界可以在未来加强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对外国诗学和诗歌创作的翻译与研究；二是要加强对外汉学家研究中国诗人成果的翻译和评论。傅璇琮先生主要的论题是日本与朝鲜汉诗的创作与翻译情况。蒋寅先生和钱志熙也分别就世界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

围绕着“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主题，与会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作了深入的阐述。李庆本教授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唐景观诗的跨文化解读角度来看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张西平教授作了《〈唐玄奘〉与中古文学》的演讲，指出《唐玄奘》杂志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以英文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推介，有力地促进了二十一世纪东西方文化的融通。

除了以上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外，还有两位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述了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艺。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正英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我国西域绘画等艺术向欧美的早起传播及缺憾》，徐先生认为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蕴含着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丰富艺术宝藏。这些艺术宝藏因为历史地理的原因，长期不被世界关注，而首先完成对这些艺术

作品发掘工作的人，竟然是那些怀着各种目的来华的西方盗宝者。他们对中国艺术瑰宝的盗掘虽然客观上使一些艺术珍品有了重见天日的一天，但是很多艺术珍品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反而要么被永远封存，要么毁于战火。徐先生最后指出，这些艺术作品在今天要想真正展现出自己的艺术魅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伟大的祖国。北京语言大学的程龙博士的演讲题目是《华裔考古学家杜成浩的跨文化解读》，程博士以自己在缅甸的亲身考察经历为切入，论述了缅甸华裔考古学家杜成浩的人生传奇，通过杜成浩的人生揭示出，中南半岛地区复杂的文化交融性，以及由这种文化交融性带来的奇特民族思维。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墨菲先生所作的报告为《将环境正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中的留存视野带入当代文学之中》，他从生态经济学家和女性主义这个角度来对我们当今社会某些国家的疯狂的积累无限制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引用多位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来说明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下人类的焦虑与变异，同时他还关注了多位南美女性作家，指出在残酷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女性日益加重的生存危机正在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晶先生所作的主题演讲《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视觉文化的提升》更是在现代传媒文化的泡沫膨胀危机背景下，横跨古今界限，向古老的文学艺术寻找提升视觉文化水平的良方。张晶先生提出，经典的影视作品除了视觉艺术所独具的特质外，还应具有文学作品的结构美、语言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从而摆脱庸俗走向经典。

由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所做的《边界与跨界》的演讲，可以看成是对本次会议一个很好的总结，张先生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边界，模糊边界的过程，一个国家走向世界也就必须打破各种无形边界的束缚。各种学说的无边界融通借鉴，才是未来学术研究及文学交流的正途。

在会议闭幕发言中，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引用电视纪录片《唐玄奘》中的几句话来总结本次会议的意义：“印度的历史是印度人创造，中国人记载，英国人发掘。”韩先生认为世界的所有文明都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从萌芽一直长到参天大树，每一个辉煌的文明体背后都有无数的其他文明体给他输送营养，所以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交流碰撞的结果。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我们要想对这个世界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就必须在充分理解不同文化复杂多样性的基础上，不断反思重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体系，使自己的思维与世界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同步互动。



世界文化交流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反复争论，却又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文学艺术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地位价值，以及其在整个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10月13日—14日在京召开的“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学艺术”国际学术会议还将这些话题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大会开幕发言中，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认为，所谓“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中国从未离开世界，中国和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将中国与整个世界文明对立起来。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主任韩经太教授以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为例，指出世界文明的交流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动态过程，交流中应该首先学会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不要用统一的交流语言来扼杀各个文明自身的独特魅力，而要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声传播来扫除语言交流的障碍。

对于宗教文化问题的探讨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要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在名为《文化交流中的互动与重构》的主题发言中，以陈寅恪先生“异族之故书和外来之观念”的治学方法论为切入点，指出文化交流当中的思想互动和知识的重构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矛盾，其根源就在于各个文明在阐释其他文明思想成果时，不自觉的加入了民族本体观念，从而产生了误读，误读的扩大又直接导致了冲突，不同宗教间的错误阐释正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所以要尽可能地站在被介绍文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自己的认识过程与外来文明产生互动，从而重构原有的认知体系，做到文明交流之间的真正无障碍融通。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的《基督教、文化与革命》以及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罗兰·波尔教授的《精神上的劣质酒以及自由；列宁论宗教》也同样引起与会专家广泛关注。费乐仁教授在他的发言中，重点强调了文艺复兴后基督教

《红高粱》新小说美学

郑万鹏

中篇小说《红高粱》1986年3月在《人民文学》上一问世，曾有人疑问道：“还能这么写抗日战争吗？”——这正好体现了《红高粱》独具创新意义。

《红高粱》以亲缘叙述者“我”的角度，用多过程方法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

戴凤莲花容月貌。但十六岁那年出落得丰满秀丽时不幸便降临头上：父亲将她嫁给酒坊老板生麻风病的儿子，换回一头骡子，一褡裢钱银。绝望中的戴凤莲遭强盗抢劫也不感到恐惧，反而粲然一笑——这唤起了轿夫余占鳌的男子汉气概。他以野蛮、强悍的方式为陷于绝境中的新婚女子先后除掉了吃掉她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

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

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掉了吃掉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

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

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掉了吃掉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

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

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掉了吃掉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

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

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掉了吃掉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

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

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掉了吃掉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粱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底，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